

## 以郑观应为例看早期维新思想的传统向度

顾琴儿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241)

**摘要:**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 一则出于“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一则出于对人类终极理想的价值追求, 不遗余力地从传统中挖掘出具有近代价值及永恒意义的成分和元素, 并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和重构。早期维新派对传统资源的利用包含多个方面。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四个重要方面——通变观念、民本思想、礼的学说、重商思想来加以论述。可以看到, 早期维新派对传统的诠释与重构, 事实上, 赋予了传统以新的文化内涵和生命活力, 促成了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 早期维新派; 郑观应; 传统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 前言

自19世纪中期以来, 中国进入了一个变动的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接二连三的军事侵略使得举国震动。救亡图存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与军事侵略同时而立的是西方文明的传入, 并由此开启的西学东渐的再次蒙兴。新学的传入带给了旧有传统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新旧文化相对而立而又相辅相成, 进而冲突相互消弭, 中西相互贯通, 从而呈现出传统文化近代转型之趋势。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视为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正如郭汉民先生所言: “鸦片战争前后, 中国社会的思潮还是传统的, 仅仅反映出向近代发展的某种趋势。而自19世纪70年代降同治、光绪之交开始, 社会思潮即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sup>[1]</sup>而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近代意义的社会思想即是当时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生动反映, 也是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早期维新思想即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想潮流之一。

在新旧文化冲突、融合之际, 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早期维新派, 可视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边界人物。他们主要包括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郭嵩焘、薛福成、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陈炽等人。在应对外来文化的冲突和挑战时, 这些维新志士对传统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内在批判, 但这些批判多数不是简单地以旧易新, 而是呈现为不断改造和重建的过程。他们睿智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新方, 巧妙地综合新与旧、创造与传统这两种相反力量, 以寻求救国真理。早期维新派消弭新旧文化之冲突, 会通中外文化之优长, 形成了一股要求抵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本民族资本主义、寻求变法富强、采纳西方政治制度的早期维新思潮。这一思潮汲取了新学的养料, 而从固有文化的母体中孕育而出, 因而成为了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化的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一。

限于学力, 笔者在展示早期维新思潮以及传统文化近代转型时, 择取了早期维新派的一个典型代表郑观应为研究个案, 将早期维新思想置于近代化过程中, 并以“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为研究视角, 着力于传统思想与近代思想的榫接, 尝试探讨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化及其对中国近代化思想生成的意义。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特殊的经历、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变革思想也代表了早期维新派汲取新学之养料, 吸收旧学之精华, 会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以郑观应为研究个案亦可窥见传统文化近代化的某些情况。

张昭军先生曾说: “近代思想史体现为新陈代谢的过程, 至少应包括传统思想的递嬗、新学思想的展开以及近代新学如何与传统思想榫接等内容。”<sup>[2]</sup>长期以来, 由于革命史观的流行, 人们往往把传统与近代化对立起来。学术界多关注中国近代思想的西学渊源, 而忽视了传统思想根源的挖掘与疏导。就目前学术界对于郑观应先生的研究而言, 对于其近代化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对于其思想的传统方面的论述, 国内外尚无专项的著作

或论文。每有学者论及此点，亦一言以概之曰，保守落后。对此论调，笔者小有疑意，故作此文，不妥之处，尚望指正。

郑观应活动于中国西方文化的前沿上海，他居香港、游异国的经历，洞悉西方时务的觉悟，使他有对中国面临的危机更为强烈的体认和感受。为了匡倾救危，郑观应睿智地采取了一套古为今用、由旧趋新的方式，批判地吸收了传统资源中的有益养料，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价值的重估和重构，使之发生近代转型。而这一过程恰恰体现了传统思想在近代化断裂中的连续性，分裂中的统一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通过近代转化以新的形式传衍了下来，在思想发展史上即表现为新陈代谢中的延续。

### 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知识分子提起所遭遇之时代，不但十分注意，而且颇具热心地探讨；不但议论频繁，而且颇为感叹惊惧；不但关心时变，而且分析其内容。早在1875年，郑观应所著《易言》一书中，就曾指出：“今泰西数十邦扣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年来未之有也。”<sup>[1] (P125)</sup>王韬亦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sup>[4] (P2)</sup>

时局的剧烈变动，给了郑观应等敏时之士以强大的心灵震撼。面对晚清萧然直落的社会时局，他们无不忧心如焚。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唯有审时度势，因时而变才是解救之方。因此，他们从传统中寻求“变易”的理论依据。郑观应领悟易理，有谓：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千古无不弊之政，亦无不变之法。……株守成法，不思变通，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其何裨乎？<sup>[3] (P301)</sup>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亦发表自己的变革思想，指出变革是历史发展的趋向，“穷则变，变则通，自强之道在是”<sup>[4] (P14)</sup>。为了寻得传统价值观念的支持，他又论：

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sup>[5] (P14)</sup>

将孔子奉为社会变革的先驱，赋予了儒家思想以新的涵义，批驳了那些“孔子之道不能变”的顽固派迂论，并为他变革思想奠定理论基础。

以传统的“变易”观念作为立论的支撑，早期维新志士提出了革故鼎新之方：以西方之器，补助中国之器，以充实中国之道。郑观应提出：“由今日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谏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sup>[3] (P63)</sup>

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这种救国策略，实际上，也是立足传统本位，择取新学养料，重构和扩充传统文化之内涵的过程。在《道器》一文中，郑观应进一步将这种主张作了明确阐释，提出了“取器卫道”的理论：

法可变而道不可变。惟愿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彼此洞识阴阳造化之几，行上行下之旨，无分畛域，永息兵戈，庶几一道同风之盛，不难复见于今日。<sup>[3] (P244)</sup>

郑观应进一步解释，所谓“法”者乃中国“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所谓“道”乃“弥绝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之物。“器由道出”<sup>[3] (P244)</sup>，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

郑观应取西学之“器”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而将“道”看作是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和人生最崇高的理想。“道”是“万物之母”<sup>[3] (P244)</sup>，万物皆由道出。“道”是宇宙的本源与主宰者，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它是一切的开始与万事万物的生化者。庄子曰：“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sup>[3] (P244)</sup>所谓的仁德善义无不归于“道”中。“道”是人类最根本的信仰和行动的总准则，修身的根本就在于“修道”。郑观应提倡人们“修道养德”，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妒，如此乃为有道。郑观应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道”，具有着崇高的价值，它不仅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甚至可以挽救全人类。故而，他将“先王之道”看作“万世不易之大经”<sup>[3] (P244)</sup>，看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规范和理想追求。

这种关于道与器的论调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共识。王韬在为郑观应《易言》所写的跋语中说过“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

也”。<sup>[3] (P167)</sup> 薛福成亦称：“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其风气所趋，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sup>[6]</sup> 这些观点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也体现了迎接挑战、把握时机、乘时备势的历史主动精神。

## 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历代政治家治国安邦、应对社会危机的古老药方之一，它的理论直指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存在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如何缓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对立紧张的关系。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宣扬维新思想，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对专制政治最具有批判精神和改良意义的民本思想自然成为他们批判专制、倡导民主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早期维新派的各种改良方案中蕴涵着浓浓的民本主义情怀，重民养民等类似的民本主义语言和思想逻辑在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中亦比比皆是。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思想较古人更加敏锐，没有故步自封，没有局限在旧民本的框架里走向僵化、封闭和保守。他们从西方政治中汲取了一些有益的养分，如“平等观”、“民权说”等先进思想，来充实和改造民本思想，丰富自己的改良方案，从而使得自先秦时期就已发育成熟的民本理论走出了日渐僵化封闭的理论框架，重获新机。

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主观认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杰出代表郑观应坚信：近代以来从西方输入的民主思想并非西方所特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孔子儒家中已包含有民主的端绪。例如，孟子关于“民贵君轻”的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语，“舜、禹之有天下也不与焉”，“为君难，为臣不易”等等<sup>[3] (P332)</sup>。郑观应先生在《易言》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上古三代早已存在事事由臣民议定的民主风尚：

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缙绅相议于学校。故孟子有左右诸大夫之信未可尽信，必察国人皆言，而后黜陟乃定。汉朝飭博士议复，尚存遗意。<sup>[3] (P102)</sup> 借助于历史和传统的权威，郑观应为他宣扬西方的民主主张找到了重要的传统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又将传统的民本思想注入设议院、行君主立宪等民主内涵，并自觉地运用儒家的民本思想去阐释西方的平等观念、民权学说等。对于君民关系，他主张立君为民说，强调人民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并为此勾勒出了一幅君民和谐的美好画面：君民之间互敬互爱、同心同德、上下一心、交泰互利。对于为君者，他提出圣人勤民论：

使为君者，毋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曰薄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sup>[3] (P333-334)</sup> 为君者应心系天下，勤政爱民，以民为本，视天下万民之事如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

为了达到君民间的和谐，郑观应主张设议院、行君主立宪，他认为议院可“通上下之情”，融洽君民关系：

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融洽，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苦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sup>[3] (P313-314)</sup>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从郑观应、王韬到何启、胡礼垣等，他们的思想中大多贯穿着一条设议院、行君主立宪的主线。他们的主张和方案，最基本的要求是广开言路、去塞求通，解决君民上下隔绝的问题。王韬衷心希望中国能开议院、通民情。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

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sup>[5] (P14)</sup>

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看来，以议院作为君民相连的中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君民之间“情谊相隔，好恶各殊”的问题，使君民关系得以融洽，举国心志如一，朝野上下同心同德，合众志以成城，也就实现了君民和谐的理想状态。

早期维新思想家以“仁爱”、“道德”为情感纽带，以“议院”、“立宪”为中介工具，既发扬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外来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从而创设出了一幅君民和谐的理想画面。由此观之，他们对于传统思想中“民本”的理解并非只停留于现实的、制度的层面，还包括了价值和理想的追求。

### 三、“行乎礼之真者，国之兴也不难”

一个国家要实现近代化，必须使全民族有一个能够承受近代文明的心理层次和文化心理结构。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传统士大夫心中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除了极少数进步知识分子们能够认识到中西文化冲突的深刻意义外，绝大多数人依然是“不顾事机之顺逆，不计焜源之盈细，则亦虚情之议论积成习尚，貽累天下国家之尤者也。”<sup>[7]</sup>为使恪守传统与学习西方这两个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主潮找到一个切合点，为在两难境地中找到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以往传统的价值系统便开始发生了与事物自身逻辑不相符的扭曲和畸变，其对文化的选择也必然表现为避害趋利和急功近利的方式，以使核心价值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礼”在中国古代不仅位列“六艺”之一，而且与“仁”同为中国传统儒学体系中的两个最为核心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礼”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sup>[8]</sup>（昭公五年）《礼记》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sup>[9]</sup>（卷一曲礼上）。可见，“礼”的内涵极其丰富，它几乎囊括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等各方面的形式与规范。

早期维新思想家“礼学”思想根深蒂固，从传统“礼学”出发，他们援西入儒，会通中西。王韬主张学习西方，但同时他又指出：“善为国者，当以礼义为甲冑，忠信为干橛，仁德为墉壕，谦逊为玉帛。”<sup>[5]</sup>（P203）以儒学作为他的接纳西学的基干。而郑观应对于“礼”更是推崇备至。通览《郑观应全集》，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礼”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理解与体悟。郑观应曾专门作《典礼》上下篇，系统论述“礼”的学说。他援引群书古义证明礼的重要性：

《传》曰：“礼，所以安国家，宣社稷也。”《记》曰：“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心。”古人之于礼也其重如此。……古人于行礼之时，或愆仪失节者，皆知其为征之先现，祸机之将发。如临食而叹，闻乐而忧，执玉之俯仰高卑，趋走之视流行速，皆是也。<sup>[3]</sup>（P377）

显然，郑观应把“礼”当成是“安国家，宣社稷”<sup>[3]</sup>（P287）的经济之学。他着眼于礼之于政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了礼“经世”、“治世”的内涵，赋予了传统的“礼”以鲜明的时代色彩。

鉴于“礼”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早期维新思想家大多竭力倡导礼教。郑观应认为礼教与政治密不可分，“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sup>[3]</sup>（P287），“行乎礼之真者，国之兴也不难”<sup>[3]</sup>（P377）。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所以社稷危亡，民心涣散，其关键原因之一在于“礼教失传，礼意寝废”。故而，他建议当政者“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sup>[3]</sup>（P490），教化万民，以正人心、正世风。为唤醒国人，他又将中国今日之礼与西方之礼相比较，指出西礼实质上“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sup>[3]</sup>（P376），而中国之礼演变至今却违背了古礼的本真，“徒见虚文外貌，而礼之本原不可得而知也。”<sup>[3]</sup>（P377）为此，他大声疾呼为君、臣者应行真礼，复古意，摒弃虚无繁华的礼节，“礼从俭”，“事从俗”，重归礼之本真。

在将“礼”政治化的同时，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于“礼”也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以郑氏为例，郑观应先生认为“礼”与“理”相通，并赋予其以人性化的内涵。郑观应解释，“礼者理也”<sup>[3]</sup>（P378）。这“理”、“礼”相通的诠释，把“理”提高到至高无上、涵盖万物的先验性本体的地位。“理”被高度泛化，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人事上的“礼”，体现礼节、礼仪；政治上的“礼”，体现为礼教、礼治；人性上的“礼”，突破了其既定的规范，体现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过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经过郑观应的阐释，传统儒学的礼学思想与义理相胶合，带上了时代的色彩，“礼”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礼”与“仁”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维新派在努力倡导“礼”的同时，也未忽视“仁”的价值。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多次强调要施仁政以得民心，以安抚为要，教以忠孝

节义之理，减轻他们的徭役赋税，使他们安居乐业。他倡导“仁政爱民”的思想：

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sup>[5] (P17)</sup>

郑观应不但强调“仁政”，而且将“仁”作为其内在的精神追求。他主张“仁礼并重”的修齐说，把“仁”作为其内在价值的实现，把“礼”看作“仁”的外在表现。他还倡导人们“存仁修德”<sup>[3] (P49)</sup>、“好礼乐道”<sup>[3] (P51)</sup>，提高自身修养。

总之，早期维新派建立了一套与传统以儒学“重礼”、“求仁”为宗旨，以综合吸纳古今中西之学为宏愿的新学。他们虽未建立一个能救中国并正确指导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新儒学体系，但他们为传统儒学的根本性转型，为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创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料。

#### 四、“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

与中国数千年传统中占主要地位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崇本抑末”观念截然相反，早期维新思想家将商务的兴衰看成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卷也”<sup>[10]</sup>。郑观应对商务也极其重视：“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sup>[3] (P607)</sup>在郑观应看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立国的根本。商业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商以贸迁有无，平场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sup>[3] (P607)</sup>

商业关系到人民与国家的共同利益。商业的盛衰与农业、手工业、教育事业等都息息相关。士农工商四者之中，真正居于首位的，应是商业。为此，郑观应援古论今，强调商务的重要性：

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昭商暹罗逐缅甸寇而主偏陲。……亦可见中外古今，不尽屏商为末务。<sup>[3] (P604)</sup>

子贡、百里奚、弦高、吕不韦……郑观应不吝笔墨，一一列举了中国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商人。他们均以商人起家，或位及人臣，或保家卫国。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他们都曾风云一时。由此，郑观应得出结论，在古代，商业也不尽然是末业。

其实，若将早期维新派的重商思想推本溯源，我们不难为其找到一些传统的依据。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虽为传统思想的主流，但在这主流思想之中难免会，也必然会夹杂一些与之相悖或相离的潜流。诸如人们在倡导重农的同时，也往往强调商业的重要性：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sup>[11] (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sup>

除此以外，历史上也不乏一些对主流思想的质疑者。例如南宋时期，叶适就曾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sup>[12] (卷十九史记一书)</sup>明清之际，黄宗羲在总结前人优秀思想的基础上，更为深刻、更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观念背道而驰的思想——“工商皆本”。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引用儒家经典明确地阐述商业的重要性：“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国者，盖皆本也。”<sup>[13] (明夷待访录·财计三)</sup>两百年后的早期维新志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了黄宗羲的这一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家汲取前人思想的精华，同时又联系时局，对“工商皆本”这一思想作了更为深层的阐发。他们将振兴商业看作富国强兵的根本，“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sup>[3] (P595)</sup>。为了抵制外国侵略，保护国家利权，实现富国强兵，他们还提出“商战”的思想。如郑观应指出：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sup>[3] (P586)</sup>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是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的共识。早期维新派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对当时的时局作了透彻的分析，看到了列强在军事上蚕食

中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侵略。为此，他们大胆地提出了“以商立国”的思想，认识到商业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说，他们的这些观点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国民族经济振兴和发展的，是十分进步的。

### 余论：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化

考察郑观应的早期维新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他的思想在不同方面都受到了西方观念的影响，但他并未意识到，也从不愿站在西方思想的立场上去背叛传统。相反，他自诩能发掘传统的原始精神，不过借外来的观念加以表述而已。在理性上，郑观应从未否认过传统的近代价值。相反，他深信传统本身内涵着具有近代意义成分，更承载着超乎功利性的永恒的价值元素。

本文择取郑观应早期维新思想中四个重要的传统向度——通变观念（哲学维度）、民本思想（政治维度）、礼的学说（伦理维度）、重商思想（经济维度）来加以论述。这四者从不同层面，揭示了郑观应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和重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体现了传统思想在近代化断裂中的连续性，分裂中的统一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通过近代转化以新的形式传衍了下来，在思想发展史上即表现为新陈代谢中的延续。

另一方面，郑观应并不仅仅把传统作为变法维新的工具，传统还承载了他的价值诉求和人生理想。通过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体悟，郑观应确实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希图通过焕发传统文化的青春，来挽救沉沦的祖国、挽救人类。出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于维护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内核的坚定信念，他孜孜以求，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具有近代价值、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元素。正如通变观念中所体现的乘时备势的历史主动精神，民本思想所内涵的追求和谐的精神，仁礼思想中所表现的对“仁”的精神追求，重商思想中注重国计民生的务实精神等等。而所有这些都统筹于并回归到传统的最高层面，即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和人类共同理想的精神内核。郑观应通过对传统的人性化或理想化的诠释，赋予了传统以鲜活的生命力，在哲学、政治、伦理、经济等各个层面揭示出传统中具有永恒意义和人类共同理想的精神内核。传统亦被以道德为主体的理想主义高度泛化，内涵了人类社会永恒的真理元素和人类的终极理想，并由此发生了富有魅力和生命力的近代转型。

恩格斯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sup>[14]</sup>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若没有以传统为依托，也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郑观应依托于传统来弘扬他的维新思想，并构建他的理想王国。中国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乃至中国近代的其他思想家们在构筑近代新文化之时，亦是如此。这正如有的哲学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近代，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些革命和先进人物，不断地回顾先秦诸子和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sup>[15]</sup>

早期维新派建构传统文化新体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有工具理性的传统文化。他们将传统作为阐释、宣扬维新思想的工具，采择中西文化之所长，重构传统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以西方的现代性价值作为参照，挖掘出传统中与现代观念相会通的成分，将其作为中学嫁接西学的砧木以及阐释西学和重构传统的依据。如传统的变通思想、民本思想、仁礼思想、重商思想就曾起过这种作用。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这些现代的新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存在一致的地方。因而，他们运用西方观念诠释中国传统，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具有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阐发出来，弘扬起来，以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中华文化精神确立新的基础。而早期维新派对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事实上，扩充了传统文化的内涵，赋予了传统以新的生命活力，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

二是带有价值理性的传统文化。早期维新思想家大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理解和体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早期维新思想家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在理性上从未完全否认过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深信传统中内涵着独有的具有永恒意义和人类共同理想的价值成分。如王韬对传统中的大同理想的追求：“此其理，中庸之圣人早已烛照而券操之。其言曰，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即继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此之谓大同。”<sup>[15]</sup><sup>(2)</sup>这种承载着人类共同理想的传统元素，即是早期维新志士的最终的价值追求。

正如张光芒先生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思想资源是对中国近现代启蒙的启蒙。”<sup>[6]</sup>王先明先生也指出：“近代中国的新学，既是对中国旧学的否定，同时也是旧学的蜕变和再生。”<sup>[7]</sup>传统文化中尽管存在着一些带有封建性的、与近现代相抵触的成分，但其中也不乏某些先进的、有价值的、与近现代相协调的因素。这些思想在本质上虽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但与后者也不无灵犀相通之处。中国近代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在有意或无意间获取了来自传统本身的灵感，大力挖掘出传统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中西会通的纽带和桥梁；全力阐扬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以挺立中华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竭力发掘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元素，作为人类终极理想的价值追求。

以郑观应的早期维新思想为中介，我们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近代化的某些情况。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早期维新思想家在传统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睿智。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重归于传统，从传统中挖掘出具有近代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元素，从而搭建起了一座从传统通向近代，从现实人生通向理想人生的桥梁。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中与近代性相冲突的成分被剔除出去，与近代性相会通的成分被继承下来，而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则被进一步弘扬开来。经过上述的区别对待和多重处理，传统以新的形式传衍了下来，在思想发展史上呈现出新陈代谢这一过程。

#### 参考文献

- [1] 郭汉民. 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
- [2] 张昭军. 传统的张力[M]. 吉林: 人民出版社, 2004. 2.
- [3] 郑观应. 郑观应集(上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4] 王韬. 弢园尺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5]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薛福成. 薛福成选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03.
- [7] 郭嵩焘. 郭嵩焘奏稿[DB/OL]. <http://www.sslibrary.com>, 1983. 410.
- [8] 杨伯峻. 春秋左氏传注(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266.
- [9] [汉]郑玄注, [唐]孔颖达等. 礼记正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5.
- [10] 陈炽. 陈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38.
- [11]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255.
- [12] [宋]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73.
- [13]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第一册)[M].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47.
- [14]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4.
- [15] 冯契. 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9.
- [16] 张光芒. 启蒙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5.
- [17] 王先明. “参采中西创新知”——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文化特征[J].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07, (3): 53.

## The Traditional Direction of Early Reform Ideas seen from the case of Zheng Guanying

GU QIN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a strong Western culture, the early Chinese reform group

discovered a modern and eternal elements and Constituents from the tradition effortly because of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ission of saving country for survival. Besides, they interpret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Chinese tradition, too. The early reformers used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s in many aspects. In this paper, I choosed four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to discuss ,which are the ideas of change, the Concepts of thinking people as the fundamental, the study of rites ,and the theories of thinking the commercial to be important. We can see that, the early reformers interpret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Chinese tradition, which has given the tradition a new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vitality in fact. So that traditional culture transformed to a modern one.

**Keywords:** Early reform group; Zheng Guanying; Tradition

